

《文化偏至论》和《民族改造论》 中的“国民性”书写研究*

许赛**

目 录

- 一、引言
- 二、反对传统，追求变革
- 三、批判“物质文明”，渴望民族启蒙
- 四、“国民性”改造的双重内涵：启蒙与革命
- 五、个人和集体——反抗和顺从
- 六、结语

一、引言

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和李光洙的《无情》（1917）是对传统文学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并开创两国近代文学之先河的作品。因此，两人也被公认为两国近代文学的开拓者。但是，伴随着一系列近代政治事件的发生，他们的文学观念、民族立场、启蒙意识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后人的评价也大多具有“一边倒”的特征——对于鲁迅，从“国民性改造”的求索到“民族劣根性”的呐喊，国民性的启蒙成了其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并为后人所尊敬；而关于李光洙，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过于显露的亲日行为，致使文学界至今都否定着他对韩国近代文学的功绩，对他的研究也大多是绕开了“政治正确”的磁场，单纯的以文学价值

* 本文为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代性视域下韩国近代文学的儒家文化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8YJC752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17年校级课题“《泥土》中女性人物主体性建构的研究”（N2017003）研究成果。

**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讲师

的立场出发进行分析、解释。因此，为避免“一边倒”的论述，本文不是对“爱国者鲁迅”和“亲日派李光洙”的比较，而是基于各自作品的内容，探讨现代性的文学思维刚刚进入两国的初期，近代的文学家对待“民族改造”和“国民启蒙”的不同策略和意识的研究。

二、反对传统、追求变革

作为诞生并成长于近代初期的作家，鲁迅和李光洙均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传统的反抗以及对现代性的追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8）（下称《文》）¹⁾ 的开篇便指出中国“自尊自大、抱守残缺”的传统偏执思想，这种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状态直至“海禁既开，哲人踵至”时才得以逐渐改观，于是“近世人士”提出“以革前缪而图富强”（p.358）的强国之路。无独有偶，李光洙也在他的《民族改造论》（1922）（下称《民》）²⁾ 中对“堕落的民族性、社会民众的利己性、虚伪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主张从道德层面着手开启启蒙自新之途。文章中，他们都采取了“自我否定”的方式对传统的弊病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并且认同“改革图新”是解决两国现状的唯一出路。也就是说他们的现代性启蒙是建立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或“自我改造”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但是，从主体性的角度观察，鲁迅在国民性的改造、现代性的追求等语境中一直试图向世人阐释“偏至”的危害及“均衡”的必要，他的启蒙策略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固守成规，而是“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取今复古，别立新宗”（p.363），在启蒙诉求中的主体性特征较为明显，有的学者还认为他的这种启蒙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³⁾；而李光洙的启蒙从“道德性”改造开始到国民的“现

1) 本文对《文化偏至论》的引用来自中国华侨出版社的《鲁迅经典大全集》，下文中的相关引用不再具体说明，只做页码标注。

2) 本文对《民族改造论》的引用来自韩国三中堂出版社的《李光洙全集》，中文翻译为笔者自译，下文中的相关引用不再具体说明，只做页码标注。

3) 汪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三联书店，2008，第152页。

代性文化认同感”的建构，试图摒弃所有传统的东西并将朝鲜带入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是完全建立在西化的启蒙思想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社会，对于一个“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而言这种启蒙无疑是被移植的启蒙、他律式的启蒙、殖民化的启蒙⁴⁾，用鲁迅的话来形容就是“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p.358）式的“偏至”化启蒙。

三、批判“物质文明”、渴望民族启蒙

尽管自文艺复兴以来，物质的发展和科学的发现对启蒙运动产生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但物质、科学本身并非启蒙运动的目的，而只是启蒙运动的工具。从根本上说，启蒙运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人的解放”。⁵⁾ 对于过度倚重物质的现代化文明的矛盾，两位作家都是有所觉醒的。鲁迅对此指出“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继而提出了“非物质、重个人”（p.360）的思想，并以此作为现代性追求的根本目的，确立了“国民性改造”的启蒙主义文化思路。

李光洙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警觉也是从物质文明的两面性中发现的，“事实上，现代的人生正处于十字路口，他们在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将工业的发达、科学的发明、军队、宪法、条约等作为使人生得以幸福的条件。然而，时至今日，他们似乎感觉到了这种信仰只是一种妄想，并且处于不知如何是好的彷徨之中”⁶⁾ 可以看出李光洙也是认同起源于西方的近代启蒙运动在经历了近400多年的发展之后已将曾经的启蒙工具——“物质和科学”错位到了启蒙目的上来了。物质文明的高扬必然导致精神文明的低落，这是19世纪社会弊病的根源

4) [韩]황종연: 《문학이라는 譯語》, 《韩国文学与启蒙谈论》, 文学社和批评研究会, 1999, 第12页.

5) 赵歌东: 《启蒙与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第13页.

6) [韩]李光洙: 《艺术和人生》, 《李光洙全集》, 三中堂, 1972, 第359页.

所在，由此李光洙发出了“将帝国主义的世界改造成民主主义的世界，将资本主义的世界改造成共产主义的世界，将生存竞争的世界改造成相互辅助的世界，将男尊女卑的世界改造成男女平等的世界”⁷⁾的呼声，将民族启蒙的视线转移到了人的精神层面，提出了“道德性启蒙”的主张。因此，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归根结底是关于民众的启蒙论，更进一步讲就是关于民众的内部精神层面——道德的改造论，这和李光洙接受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是有关联的。勒庞认为构成国家、国民的群集并不是作为“理性的、自律的、主体的”个人，因为在群集情况下，个体将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转而由群体代替自己的精神。⁸⁾因此，李光洙眼中的“民众”便成了感性的、他律的启蒙对象，他试图通过对大众的内在道德精神的改造来达到思想互为统一的群集效应。但这种“统一划分”式的民族性改造论正好契合了当时日本殖民主义对朝鲜进行“文化统治”的策略意图，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更批评他的民族改造论是一种和“文化法西斯”同轨的意识形态。⁹⁾

四、“国民性”改造的双重内涵：启蒙与革命

中韩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启蒙运动均不是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而产生的内部更新，而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后被动推进的“外诱变迁型(exogenous change)”的“外源现代化”。¹⁰⁾因此，两国的启蒙需要在物质、文化、制度等“外源”配合之下开展“内源”性改革，即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也就是说对于“外援化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外源”的改革要重于“内源”的启蒙。然而，两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矛盾就在于“外源”的现代性和“内源”的传统性之间的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的焦点主要在于“人”的观念。因此鲁迅和李光洙在看清了物质文明对启蒙

7) [韩]李光洙：《民族改造论》，《李光洙全集》，三中堂，1972，第123页。

8) 古斯塔夫·勒庞 著，冯克利 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9) [韩]이성희：《李光洙历史小说中的民族观》，韩国木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7页。

1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第131页。

运动的影响之后都指出了关于民族改造的方向，那就是就对“人”的启蒙。可是，鲁迅所主张的不是盲目的西方式启蒙，他并不否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向西方学习的观点，只是那需要建立在“去其糟粕”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鲁迅的启蒙之道是效仿不“偏至”的西方文明，并最终用于改造中国或改造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因此，鲁迅的启蒙是先“外源”再“内源”式的改造。

相比之下，李光洙的启蒙方案则显得较为“内敛”。他通过对“民众道德性改造”（p.133）论的提出将启蒙的视线统一到到了民族的内部，他的这种偏重“内源”改造的启蒙策略，本身就与“外援化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发生了矛盾。因此，他所谓的民族改造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从西方移植至朝鲜的近代意识或现代性的接受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导致朝鲜落后于他国的“容忍恶政、妨碍维新的‘堕落的民族性’”（p.126）上了。对此，鲁迅也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导致中国革新的最大障碍便是民族性（奴隶根性）的问题，可区别在于李光洙在批判朝鲜民族劣根性时所采取的独特的思维模式。他首先盛赞了英国“自由、务实、进取、民主”（p.125）的民族特性，认为正是由于“英国优良的民族性，被其统治的殖民地（比如埃及和菲律宾）也同样繁昌、自由”（p.125）。继而引出朝鲜“不讲信用”的民族劣根性，同时指出朝鲜人的“无信和虚伪”也是朝鲜的殖民者“日本人不信任朝鲜人”（p.138）的原因所在。这种过度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历史意识说明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诉求并不是构建于寻求民族自主、独立的国民性启蒙，而只是一个臣服于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框架之下所成立的国民劣根性的改造理论。因此和鲁迅的自主、“外源式现代化”的启蒙诉求相比李光洙的民族启蒙意识缺乏了“主体性”的创建，同时也缺少了对待“革命”的意志。因为，“外源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内源”启蒙（思想行为层次：behavioral level）的支撑，更需要对“外源”中的器物技能层次（technical level）和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的革新并进而推动社会的变革¹¹⁾。正如赵歌东评价鲁迅的现代性诉求是“革命和启蒙的双重变奏”一样，其启蒙意识也存在“革命和启蒙的双重内涵”¹²⁾，而同时期的李光洙只发现了启蒙的重要性，却在特殊的政治背

11)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31页。

景下忽视了革命的存在价值。

五、个人和集体——反抗和顺从

从两位作家对国民性改造的启蒙路径的设计来看，鲁迅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其提出了“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p.363）的以“立人”为根本的现代性追求的思想架构，从而确立了“国民性改造”的启蒙主义思路。并通过斯蒂娜的个人主义、亨利·易卜生的反民主倾向、尼采的“超人”理论的影响表现出了对先觉者（明哲之士）的渴望，同时也表达了对西方“少数服从多数”的大众民主的否定和对个人（个性）主体性的肯定。所以，“尊个性而张精神”（p.363）是他对国民性启蒙的概括及要求。笔者认为鲁迅的这种个体指向性的启蒙诉求与他和钱玄同关于“打破铁屋子”的讨论是贯通的。面对即将要“昏睡入死灭”的人们，他最终选择了唤醒其中几个觉醒者来毁坏这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其目标有两个，首先是个人的觉醒，其次是群体的拯救。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鲁迅现代性启蒙的策略是以个人为本位，目标也指向了个体的启蒙和思想的开放。纵使鲁迅的一生有使其怀疑、颓唐乃至绝望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是他对个性的解放、个体的觉醒的启蒙主张一直没有改变。

李光洙在面对“堕落的民族性”问题中也提出了用少数的先觉者拯救大众的主张，即“只有少数的善人才是民族复活的希望。……通过其中一人改造民族的自觉和决心的出现来影响大众”（p.128）。他既赞同勒庞的“大众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群集”（p.128）的理论，同时又借助这个理论用逆向思维阐述了“少数的善人”对民族改造的重要性。他期待一个觉醒的人的出现，通过这个人对民众的感化形成集群效应，以此方式展开他所谓的民族国民性的改造。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和鲁迅的主张极为相似，但从对个体主体性建构的意识角度分析，两人的

12) 赵歌东，同上书，第21页。

观点实则是对立的。鲁迅所期望的被改造的对象是不受“偏至”思想的侵扰并极力反对被冠以“民主”美名的“少数服从多数”式的“全民意志”的“大众民主”，因此，他眼中的“先觉者”是只尊崇自己的个性、精神和意志的带有反抗意识和主体性价值的存在。相反，李光洙所指向的所谓“少数善人”的个体是指“作为文明社会的一员，具有经营独立生活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诚意及能力的人”（p.137），这正好和鲁迅“反抗的个体”相对立，他的个体意识是作为一个顺从于某一个集体意识形态的存在，换言之，他的启蒙最终又回到了勒庞所批判的“无主体性的集群”之中去了。是一种在背离政治、背离革命、背离历史文化的大同世界般的乌托邦中所追求的现代性启蒙——正如韦伯、尼采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的政治软骨症及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¹³⁾

六、结语

综上，本文从现代性追求、民族启蒙意识、改造国民性的双重内涵以及改造对象等方面着手对鲁迅和李光洙的“国民性”启蒙策略进行了逐一分析及比较。近代初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韩两国的国门之后，以鲁迅和李光洙为代表的两国文人均在各自的作品中表达了对现代性追求的渴望以及对国民性启蒙的迫切要求，然而他们的启蒙策略却存在较大的差异。鲁迅作为一个追求现代性的人物的同时又扮演了反对现代性的角色，他的启蒙方案既是复杂的又是悖论式的，同时还蕴含着坚韧的反抗意志。他在倡导民主、提倡启蒙、相信科学、反对传统的同时又批判民主、怀疑启蒙、否定科学、迷恋传统。简言之，他在对待中西方文明、国民性启蒙的时候极力的反对盲目的追从，继而提出了不“偏至”的理论，这也可谓是他一生的“启蒙之道”。如果说鲁迅的启蒙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李光洙的启蒙明显是忽略了现实的重要性。他对“堕落的国民性”的启蒙理解和康德的建立于理性的“先验的个

13) 韩毓海：《自由意味着责任担当》，《天涯》，2003（第五期），第175页。

人”的认识颇为相似，所谓“先验的个人”就是对政治、文化、价值、启蒙等立场均保持中立态度的个人。由这样的“个人”所组成的集群不正是勒庞所批判的“无主体性的集群”吗？不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庸众”吗？纵观李光洙的《民》一文，通篇都是在这样一种失去了主体性并背离了现实的幻想中所构造出的启蒙蓝图。因此，针对李光洙的在乌托邦的幻想语境中所提出的国民性启蒙思维，本文将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加以总结并作为结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¹⁴⁾

14)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语录第四卷》，1949.

参考文献

- 汪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三联书店，2008。
- [韩]황종연：《문학이라는譯語》，《韩国文学与启蒙谈论》，文学社和批评研究会，1999。
- 赵歌东：《启蒙与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韩]李光洙：《李光洙全集》，三中堂，1972。
- 古斯塔夫·勒庞 著，冯克利 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
-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韩毓海：《自由意味着责任担当》，《天涯》，2003（第五期）。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theory of *Culture biased theory and Theory of national reform*

Xu Sai

In the early days of modern times, after the Western powers were forced to open the national doo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two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Lu Xun and Lee Guangzhu, expressed their desire for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and the urgent demand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National Nature in their respective works. However,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ir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their respective work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literary thinking of modernity just entered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modern writers treat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 Enlightenment,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bias, Modernity

투 고 일 : 2018. 7. 10. / 심 사 일 : 2018. 7. 15.~ 2018.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8. 8. 20.
--